

第一章

割地乞和

李鸿章升官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署了一个让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马关条约》。正是这个条约，导致台湾在中国版图上“失踪”了半个世纪之久！

历史学家说，一个国家的历史或一个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特定领域的历史，都是一个残存、交混、添加、混合的过程，而不能仅仅归结为一种表述、一则方程、一个公式、一种形象。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贝尔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历史”条目时，就明确提出，历史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三类相互补充和相互作用的范畴，即偶然、必然和逻辑。换言之，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奇特的偶然的事件，只有长期的连续性和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显然，台湾割让的历史事件也逃脱不了这种历史时间的辩证法，它就像带有泡沫的浪峰，是由强大的浪潮推动的。不用上溯很远，我们就从1870年开始追踪吧。

1870 年是德国统一和日本巩固明治维新成果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因成功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而名声日隆的李鸿章受命接替正处困境中的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此次调任直隶，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场危机有关。1870 年 6 月 21 日，因法国天主教堂虐死婴儿，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射击天津知府刘杰而引起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案发后，法国军舰立刻开到塘沽示威，其海军提督扬言“如不接受法国条件，定将津郡作为焦土”。英、美、德、意等 7 国也联衔照会清政府，并纷纷调派军舰驶向天津沿海。清廷为了防止外国军队可能的入侵，于 7 月 26 日谕令李鸿章火速率部赶往天津，与在此之前已由他的恩师曾国藩调去的 28 个营淮军会合，负起保卫京畿的使命。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当时，李鸿章正在陕西卖劲地镇压“回民之乱”。接到谕令后，他当即带着一支 25000 人的淮军上路了。从 1864 年起，淮军各营时常奉廷谕从一个省调到另一个省。淮军领袖李鸿章对这种调防早已习以为常，因此在宣召淮军赶赴直隶时，他不会想到命运将在天津拐弯。

餐风宿露，昼夜兼程。8 月 29 日，李鸿章终于率部抵达目的地。他被指派出任直隶总督，并遵廷旨驻在战略口岸天津，只有在冬季月份，天津封河时才能前往省城保定居住。不到 3 个月，即 11 月 20 日（一说 11 月 12 日）他又增授北洋通商大臣，这个职务较之以前三口通商大臣权力更加广泛。据《穆宗实录》记载，同日上谕称：“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著归直隶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身为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时年 47 岁的李鸿章成为权倾一方的朝廷重臣。就连他的恩师曾国藩也流露出酸葡萄之味：“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不独是处理天津教案，当年曾国藩讨论无功，李鸿章奉旨继之，居然功成。

李鸿章总是这样官运亨通。他生于乾隆皇帝去世后 24 年,《南京条约》签订前 19 年的 1823 年,21 岁中举人,24 岁中进士,旋被选派为翰林院庶吉士,并于 1851 年擢升编修。28 岁的士人李鸿章就这样顺利登上仕途,而太平军起义则改变了他稳步缓慢攀登官吏阶梯的前程。1853 年春,他奉旨回家乡安徽省组织团练,用于对付太平军。团练是民间的武力,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益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6 月,这个前翰林院编修手下已拥有 1000 名武装士兵,并于 8 月在安徽北部巢县第一次战胜太平军。此后,他便屡屡获赏:1854 年赏加知府衔,1855 年升为记名道台,1856 年攻克巢县后赏加按察使衔。这年底,他请假葬父,在家终制。直到 1859 年初,他才应在北京求学时的老师和父执曾国藩的邀请,加入曾幕。不久,他便得到了反对太平天国战争中一个关键性的任命。当时作为贸易和赋税主要中心的上海正受到失败后重起的太平军部队的严重威胁,朝廷敦促曾国藩采取措施保卫这个连慈禧太后也被迫承诺“不为遥制”的重要城市。1861 年 11 月,曾国藩接见在上海的江苏重要士绅的代表,他们请求他出兵上海。一度因湘军士气衰落、军纪松弛而深感忧虑的曾国藩,由于无兵可派,指示为他负责草拟信函奏稿的幕宾李鸿章速去皖北征募一支新军队,率领到安庆训练。日后几乎与湘军齐名的淮军即源起于此。

1862 年 4 月初,李鸿章率领首批准军队乘坐上海士绅从一家英国洋行雇佣的 7 艘轮船到达上海。据可靠史料记载,李鸿章乘英商轮船沿江而来,经过太平军占领区抵达上海后,连续 3 天不肯下船。我们现在很难推测这位新任署理江苏巡抚当时都想了一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刚一踏上黄浦滩,就立即意识到了西方的挑战以及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不可避免性,并且不失时机地努力使自己在同他们打交道中居于上风。在抵达上海后两个星期内,他看到了用近代西方武器直接对抗太平军的功效,开始为他的淮军购买这些武器,并雇佣了由英国人戈登担任管带的“常胜军”中的西

方教练，对淮军进行新法训练和操演。到 1862 年末，淮军已有 1000 余枝来复枪，雇佣了六七名常胜军的西方教练。不及一年，淮军已扩充到 4 万余人，这时它已拥有 10000 余枝来复枪、若干门大炮及 10 余个外国教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鸿章第一次使用“自强”一词，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掺杂。”意指采用西方先进技术，不断增强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以便在对外关系中居于优势，避免受制于人。正是这种“自强”，使李鸿章的淮军在与忠王李秀成的太平军作战时屡屡获胜，并最终把他推上了钦差大臣、直隶总督的高位。

李鸿章的擢升速度是惊人的。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广京认为：“李鸿章在清代官场中惊人的升迁，是由于在太平军威胁下异常的情形，以及他自己具备受人赏识的才干——也就是他在当时的形势下能胜任军事和行政工作的能力。”曾国藩不止一次称许他“才大心细”，胡林翼也为他的堂堂仪表所惊讶，感到他“如许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可以认为，李鸿章能在 47 岁时得到直隶总督这个接近北京的有权有势的新职位，足见他不是一个庸才。

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当然要负责直隶省事务，但由于他作为一个淮军领袖所起的作用，朝廷指派他出任这个毗邻京师的深受信任的官职，还希望依靠他履行属于中央政府官员的职责。因此，李鸿章日益担负起他钦差大臣的使命，除了通过天津、芝罘和牛庄海关道管理这 3 个口岸的对外贸易，他还有责任同外国代表讨论处理地方问题，如解决中法关于天津教案的细节，裁定英国和俄国提出的要求。不久，李鸿章的外交活动更包括那些总理衙门认为由他在天津处理更方便的全国性问题。这个时候，李鸿章事实上已成为一名全国性的官员，他通过多重的职务在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实施中，起领导作用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尤其是他负责对中国东邻日本和朝鲜的政策，正如韩国浦项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基赫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向李鸿章提出了他漫长的

一生事业中所面临所有外交问题中最为棘手的难题。”

李鸿章对于中国对日外交政策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处理，正是从 1870 年秋开始的。

中日第一部条约

追溯起来，李鸿章对日本和朝鲜发生兴趣，时间上比 1870 年他受任直隶总督后很快就亲自涉足日本和朝鲜事务更早。

凡熟悉 19 世纪中国历史的人，于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前所未有的外部危机盲目自满，必定有深刻的印象。的确，意识到西方侵略事实的中国人充满愤慨的情绪。但是他们即使意识到西方侵略，传统文化的熏陶却使他们迟迟未能具备应付新的挑战所必需的革新和改革的思想。

当然也有人例外。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清朝上层阶级众所周知囿于过分的文字训练和学习习气，尽管李鸿章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也完全属于传统模式的范围，但是当他于 1862 年到上海出任江苏巡抚，领导同太平军作战时，由于平生第一次面对西方武力和侵略的威胁，有不平常的机会深刻了解西方武器和西方军事人才，并由此产生对西方武器及技术的浓厚兴趣，第一次吸引他注意日本为了军事自强而学习和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他看到，中国人多数士大夫面对西方的挑战，不是忿恨不平，就是麻木迟钝，而日本人一旦知道西方的武装力量，便很快产生了危机意识，并开始寻找新的迎接西方挑战的方法。于是，他在上海写信告诉恩师曾国藩：

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利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

在 1864 年春的一封致总理衙门函中，李鸿章再次赞扬日本在军事自强方面的努力。他赞扬日本，目的是提醒国人也要努力“自强”。他不无忧虑地写道：

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炮弹。……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藪。

在同一封信中，李鸿章认为西方力量的源泉在于“技艺”，强调中国要成功地对付西方威胁，就绝对有必要去做日本正在做的事情，学会制造“制器之器”。他甚至建议在现行科举制度中，为专攻技术的考生创设一个新科，以资鼓励。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著名学者蒋廷黻称赞此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总理衙门将李鸿章的这封信录呈朝廷，同时奏称：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令人痛惜的是，保守的满族宫廷拒绝了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建议。想一想日本明治维新是 4 年后的事情，我们不能不诅咒当时主宰中国政局的老女人叶赫拉那氏轻易放弃了一次中国自强的的大好机会，否则中国近代史就有可能改写，李鸿章日后也可能不必承担“卖国贼”的骂名。

历史不能假设。但从李鸿章发自上海的信函中，我们看到他身上正在滋长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以天朝和历代承袭的文化自豪的新的思想。那个时候，作为江苏巡抚，他必须经常同驻上海的欧洲各国领事和海陆军官员打交道，他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力和技术方面都比中国优越；同时不会不认识到，外交的成功最后还是要依靠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正是这些阅历，使他早就认识到日本的挑战。然而尽管他致力于自强，他却注定要看到中国日益落后于日本。“是李鸿章——也是中国的命运安排，使他面对一个异乎寻常成功的国家日本。”刘广京教授如是说。

1870年秋，直隶总督李鸿章首次与日本使臣在天津遭遇。这也是中日两国中止了 300 余年的正式邦交后首次官方接触。

历史上，日本也曾是中国的一个朝贡国。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足利义满为了通过贸易充裕国库，接受了朝贡地位——从 1433 年到 1549 年有 11 个朝贡和贸易使节航使中国。然而随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家感到这样的关系是屈辱的，在 16 世纪中叶以后中断了这一做法，从而结束了与大陆的官方接触。

此次日本政府派出外务大臣柳原前光来到中国，是想仿效西方列强，试图订立一个类似中国与西方国家订立的那种商约。他特别受到指示在条约中谋求最惠国条款即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向清政府索取“一体均沾”和“内地通商”等特权。清廷总理衙门获悉柳原前光的使命，先是决定拒绝日本的要求，因为它担心同日本立约，可能给中国同朝鲜和越南这样属国的关系，带来令人不快的后果。处于困境的柳原前光求助于李鸿章和曾国藩，他们两人当时都在天津。

在清朝士大夫普遍以轻蔑和偏见看待日本的时代，李鸿章虽然也对日本人抱有戒心，但是看来他对于中国在反对西方侵略斗争中实现中日合作，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因此他热情地接待了柳原前光。在与总理衙门接触之前，柳原前光告诉李鸿章，日本被迫

同英国、法国和美国通商，这些国家利用日本，日本因而心怀不服，但日本力难独自抗拒这些大国，希望同中国合作。不管李鸿章是否完全相信柳原前光，他对柳原前光的话却没有表示疑问。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表示同日本立约不仅不可避免，甚且是可取的。他在函中写道：

日本委员柳原前光等五人，于初八日午刻来见，礼貌词气，均极恭谨。谈次以英、法、美诸国强迫该国通商，伊国君民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虽于可允者应之，其不可允者拒之，惟思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拟俟贵衙门示下，再取进止等语。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将来若蒙准奏通商，应派官前往驻扎，管束我国商民，以备联络牵制。其条约尤须妥议另定，不可比照英、法、俄一例办理，庶於大局有裨。

在总理衙门拒绝柳原前光的要求后，作为对这个日本专使的新求助的反应，李鸿章再次致函总理衙门，坚持中国既已与西方许多国家立约，不宜拒绝同日本这样一个紧邻的国家缔结条约，否则，一旦日本复挽英、法斡旋，中国除了给予通融，将别无选择；果真如此，则不仅有损中国的威信和声望，而且还会使日本转而成为中国的敌人、西方的盟友。信是这样写的：

该国向非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多失计。……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将来与之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妥委员……往驻该

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国商民，借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

可以看出，李鸿章一心想同日本结盟，以便加强中国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者地位，同时避免让日本变成西方侵略中国的基地。柳原前光等日人对李鸿章的“结盟”思想似乎也表示相同的兴趣，他们使李鸿章相信，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并非只有他一人。那时李鸿章还无法知道同时代的日本明治领导人真实的态度和意图，这些领导人正在心理上而且也在外交上使他们的国家同西方大国结盟，但李鸿章被蒙在鼓里，以至他对日本兴趣作了错误判断。

由于李鸿章的干预，总理衙门终于改变了早先的决定，奏请由李鸿章负责准备对日本订约谈判，谈判预期于次年春季开始。

这是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处理的第一个重要的全国性课题。不曾料到，1870年12月，极端保守的安徽巡抚英翰对拟议对日条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回顾明代的倭寇，怀疑日本乘中国正因天津教案而引起的危机之时谋求立约的动机。李鸿章批驳了这种论调，他在1871年1月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在1860—61年事变后几年，江浙因太平军打击而衰敝糜烂，西方各国正在胁迫中国，日本并未乘此情势要求同中国立约。至于明代倭寇，李鸿章说，那是因明朝禁绝互市所造成。他在指出日本通过采用西方技术实现军事自强所作努力成功时，再次提醒说，日本如果受到中国拒绝，必将同西方结盟，而如果加以适当笼络，它将为中国所用。他重申自己先前的建议，在同日本条约签署之后，中国派外交和领事官员往驻日本以促进中日合作制止日本不利于中国的行动。

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意见自然比安徽巡抚英翰的意见更有分量，因此当日本于1871年4月又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外务大臣柳原前光为副使前来中国议约时，清廷谕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办理两国通商条约事务。

柳原前光是明治前期的公卿、外交官，嘉永三年(1850年)生

于京都，其父为柳原光爱，妹柳原爱子为大正天皇之母。明治维新后，柳原前光出任外务大丞，并于 1870 年出使中国谋求订约，此次议约名义上虽为副使，但仍是日方主要谈判人。就是说，中日首次在谈判桌上交锋是在李鸿章与柳原前光之间进行的，而并非像有些人臆断的那样，是李鸿章与日方正使伊达宗城的较量。王玺先生著《李鸿章与中日订约》一书和河村一夫著《近代日中关系中诸问题》一书均持此说。强调这一点并非纠缠末端小节，而是欲揭示李鸿章与柳原前光之间绝然迥异的对比情况：两人年龄相差 27 岁，躯体则为彪形大汉对玲珑小生，正如河村一夫先生形容的那样，大有高矮反差极明显的日本著名相扑力士高见山与栃剑对阵之势。

谈判系根据中国提案进行。这向李鸿章提供了采取具体步骤实现其阻止日本同西方合作对付中国这一外交政策目标的机会。但是李鸿章的务实精神使他愿意在国际外交上给予日本以同中国平等的地位——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一种对于清朝确立同东亚国家和民族间关系行为的传统惯例前所未有的背离。另一方面，李鸿章在要求他认为与中国攸关的重大利益方面，并不妥协。当柳原前光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企图向清政府索取列强在华特权时，李鸿章婉言拒绝。据《日本外交文书》记载：

返回公馆后，对方条约事务委员之一，长芦候补盐大使邱睿恪来访柳原大丞。于笔谈中首先表示，本日李中堂返回衙门后，对应、陈两大人及敝人等称，东国之衣冠文物，令人钦仰，此次邀请各位大人来此议事，按昨日已告知总署，今朝已获回信称，东国素称文明之邦，又与中国为同文之国，此次通好通信，礼节详明，情殷意笃，倍加亲睦，力矫西人之旧例，庶几可使我两国之交谊与他国迥异。李中堂特委派敝人谨向各位大人申明此意。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似乎想给中国外交创立一个样板，

故特别注重“力矫西人之旧例”。一日，李鸿章在谈判间隙与柳原前光闲聊时，不经意地问道：“本约互换后，我国将派领事官驻贵国横滨，以管束侨居贵国之华人，不知贵国是否派钦差驻北京？”

柳原前光回答说：“我国与贵国虽邻接，我国民之通商往来，今仅只上海港口耳，故仅以品川忠道等予以管束已足，另派钦差驻北京并非当务之急。”

李鸿章对此表示满意：“方今欧洲各国已于北京设置公使，其中有挟虎狼之志图谋吞并者，又有伸张其国威而欲压制清国者，希贵邦与敝邦均勿重蹈此类通弊。”

柳原前光未有异议。事后看来，他对李鸿章的态度并非没有想法，但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中国做什么，他更不可能说服李鸿章让步。

1871年9月13日（一说7月29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终于在天津共同签署了一项共有18条的中日《修好条规》和33款的《通商章程》。李鸿章克服了日本长时间的强烈反对，成功地将互不侵越“邦土”、保证缔约双方中任何一方同第三国发生冲突时必须彼此相助载入条约。李鸿章坚持加上“邦土”一词，未作具体指明，意在保护朝鲜等中国周边各属国免遭日本侵略。彼此相助一款，则是他想出来用以防止日本同西方大国结盟的手段。同时，李鸿章通过谨慎的谈判，特意将最惠国条款排除在在条约之外。概括起来讲，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结，不可稍有侵越。
- 二、两国互派公使驻京。
- 三、互设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
- 四、如果第三国威协恫吓缔约国一方，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
- 五、两国商民准在双方指定的通商口岸来往贸易。
- 六、两国兵船得来往于对方各通商口岸。

七、两国商货进入对方口岸，均照对方海关税则纳税。

八、准许两国官民在对方各通商口岸租地建房。

九、两国通商章程十年后可以重修。

这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条约，其中各项条款对缔约双方都是平等的。诚如台湾学者王玺先生在《李鸿章与中日订约》一书中所说：“该约不仅为中国空前未有之平等条约，即对日本而言，亦为其平等条约之嚆矢。”

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观察家指责这个条约是针对西方的中日军事同盟的象征。美、德两国公使甚至郑重其事地提出照会，询问条款第二条“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是否表示中日同盟之意。

可以认为，李鸿章坚持与日本订约的目的基本达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谈判桌上取得了胜利，应该不是过誉之辞。

让李鸿章始料不及的是，条约墨痕未干，言犹在耳，日本政府就开始违约背信了。

1872年3月，柳原前光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他是奉日本政府之命，来试图修订刚刚签署的新条约的。

在新约批准之前就要修订条约，可谓旷古奇闻，只有日本人才能干出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据说，日本政府对日本没有给他们以西方各缔约国在不平等条约下所享有同样的在华权益和特殊权利，甚感不快，日本外务省甚至对中日彼此均享有领事裁判权亦大为不满。具体地说，他们要求取消彼此互助的条款，以免“西方生疑”。此外，他们希望增加最惠国条款，以便日本能够得到和西方缔约国同样的法律上平等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在华实际利益。他们还极为无理地要求单方面取消中国在日本口岸对中国商民的领事裁判权。

3月20日，柳原前光抵达上海，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进

行了接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与西华的谈话，从中可见柳原前光要求修约的决心有多大。下面就是两人的谈话摘要，其中的伯云系指西华的发言。

伯云：阁下此次前来之目的，乃专为与李鸿章对谈。
李鸿章属当代该国之一等人才，性格刚猛，具有坚持其主张轻易不予转变之气概。态度极其从容，机变缓急，尤需格外留意。

柳云：下官自前年以来，曾与李屡次接触，善知其气质。此次一举，实决定两国交好之关键，以我之弱冠不才负此重任，唯克尽绵薄之力，仍恐不堪胜任。

伯云：此乃影响亚细亚洲大局之事件，列国对其如何落实均拭目以待，我方祈愿阁下此行排除万难，虽不能十全亦可完成其半。此乃阁下之洪福，不揣冒昧请问阁下年龄，依我观察可能为二十五六岁。

柳云：今年 23 岁。

伯云：果不出所料年青，下官如今已年逾 40，尚处于总领事职位，而阁下已出任公使职衔，实乃非凡之英才，敬服之至。

柳云：承蒙过誉，惭愧无地。前光年轻才疏，谬膺重职，悚恐之极。况今又当两国新交之际，以一弱躯承担此列邦尚无先例之至难交涉事件，自揣不堪胜任，唯是日夜苦虑，以祈愚者之能有一得。

据河村一夫推测：“柳原在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会谈时，其所以表明悲壮的决心，正是面临下月即将与李鸿章进行棘手的交涉所致。”

果然在 4 月 9 日与李鸿章第一次会谈时李鸿章对这种“侮辱中国”，出尔反尔的作法，据理加以激烈的驳斥。据《日本外交文

书》记载：

李愕然而云，此何言耶。前年尔等前来求约，余已深尽心意，去秋于此地山西公馆两国钦差全权会晤，遂使两国约成。其时观者如堵，既然伊达与吾亲手画押以证信守之条约，当不容任何干扰。吾代表国家，伊达氏亦然，对天下惟信而已。然如欲妄加裁撤删除，将成何体统。

5月26日，柳原前光再晤李鸿章，仍坚持修约。李鸿章寸步不让，再次予以反驳。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日请修好条规通商章程缔结问题》史料集记载，李鸿章此次反驳从午后4时开始，6时结束，长达两个小时。现从河村一夫著《近代日中关系史诸问题》一书转引李鸿章论驳要点如下：

李云：各位为前年以来之旧知，此次来访理当欢迎款留，惟因贵国来议之故，公议所在难以徇私情。尚未待尽地主之谊，各位即又归去，惜哉，阁下来不逢其时，兹行将启程之际，余拟告阁下，请详加听取，并转交余致外务卿复照公文，烦子斋回。总理衙门本应对来文复照，鉴于贵国此举不胜惊愕，难以回答，故余嘱笔照复，希予转告此意。又对伊大臣之处境，不胜兔死孤悲之感。本欲对其来书函复，奈力尽词穷，难以表达心意。余深察其凄凉之情，亦无可奈何，总署及本中堂等皆然。只望阁下归国后善为转达此意。惟今外务卿照会蔑视我国，自失其信，可谓失措之甚，岂容默视。夫赏罚乃理国之柄，伊大臣有何罪而免官，为何不予奖赏。若为惩罚而罢免其官，则我可立即扯裂约书，断然绝交如何。阁下今归国，应使伊大臣官复原职如何。

柳云：伊达氏之免官，据闻依其本身之所请，如今能

否官复原职，我难以答。但对公之为伊达氏如此深切悲慨之情，必将转告之。

李云：对两国全权代表订立之条约，无端修改之例，恐万国皆无。不知外务卿若出于有意之举，夫愚也，或出于无意之举，夫暴也。毕竟因贵国议论多歧，赏罚不明，以致伊大臣受侮。如今余对此苛细不稽之论，裁撤削除之无礼主张，然能默视不问，此乃鸿章不堪愤懑之至者也。试想身当全权代表之重任，尽其生平之力以立约，或得以无误。若或有误，对其小者谅之，大者谋求变通，始顺乎两国友好之情理，公私均无害也。如斯我国亦不枉逼贵国之所不欲，除裁撤削除条文外，贵国之任何倡议均可。夫贵国与我人伦五常，自不待言，致文物风俗容貌学术皆相近，素来亲密无间，且我国视贵国为仁义文明之邦。去年与伊大臣议约之时，我之所望亦别无他意，惟在舍弃如英法之乘战威，趋于贪利，压逼杀权之例，以至公至平取信，以垂不朽而定其议。两君依同等之礼，全权使臣亦视为兄弟，彼此悦服修约，孰料伊大臣复命后，群议交攻，致使不再来华。今若以我国鸿章之忍让屈从于贵国之暴举，则导使鸿章平生乖离，酿成终身之奇耻大辱。若思及此项立约何以招致如此议论，悔恨塞胸，贵国之不达事理何其甚也。如贵国为期外交大盛，有修订条规之举，如拟改议两国约议，何不议定续款。夫鉴之通例，如待此议，我岂有拒绝之理。贵国即不信赖鸿章，亦不屑顾本国之全权，嗟嗟概蛮夷亦不敢如此妄为者也。但愿阁下归国转告外务卿辅，虚心熟虑，重归交际之正理，若再有裁撤之论，鸿章唯誓死拒绝。

李鸿章的批驳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又不乏人情味，非常精彩。据他事后宣称：“该使唯唯而去，察其情词，颇似知感悟。”云云。

据此,日本不得不作出妥协的样子,于 1873 年 4 月派出外务卿副岛种臣使华,在天津与李鸿章交换条规批准书,生效。同行的有副使柳原前光和被日本天皇任命为外务省二等官的美国人李仙得。

交换了条规批准书,并不等于日本真的就此善罢甘休。几乎是接踵而来的两件事,不仅打消了李鸿章也许曾经有过的在共同反对西方的斗争中中日合作的任何幻想,而且使他看清了,换约也是日本侵台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准备借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一事,公开制造侵台事端了!

牡丹社事件

琉球是一个小岛国,地处中日两国之间,公元 1372 年即明洪武五年,与中国正式建立藩属关系,上表称臣,按时朝贡,并派遣留学生来华就学。此后 500 余年间,琉球始终承认是明清两朝的藩属,并和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直到 1866 年(同治五年)琉球国王尚泰的封典仍由清政府完成。日本在 1591 年侵略朝鲜时,曾强迫琉球为其军队输送兵食,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1609 年,日本再遣人督责琉球朝贡,琉球不从。于是派兵侵入琉球国都,将国王及王子大臣数十人掳至日本,迫其纳贡。即使如此,琉球仍向清朝纳贡,以求保护。明治亲政后,居然不顾清朝政府的强烈反对,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幽禁于东京,同时玩弄外交伎俩,诡称琉球已归属日本。

1871 年 12 月,有两艘琉球渔船在海上遇到飓风,漂流到台湾东岸,其中一艘遇救,被安全送到台湾府,另一艘在台南琅峤北瑶湾触礁而沉,船员上岸后与当地牡丹社居民发生冲突,结果 54 名琉球渔民被误杀。史称“牡丹社事件”。

此事发生后,日本为侵占台湾,就借事生风,歪曲历史,把琉球渔民称作日本属民,向清廷抗议,并扬言出兵讨伐台湾。

台湾因系中国东南门户 海防要地 所以近代以来常遭到外国的觊觎和入侵。一般以为 在侵台的外国中 以荷兰、日本为最 而且以荷兰为先 明清交接之际 日本在后 19世纪以后 其实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侵略的先后顺序应颠倒过来, 而为日本在先, 荷兰在后。这就要说到日本历史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丰臣秀吉。这位幕府重臣在国内的统治与侵略朝鲜的战争无人不知, 不过, 他还有一段‘蛇想吞象’的史实与台湾有关 却鲜有人知。那是朝鲜战争的第二年(1593年), 丰臣秀吉即派使者原田嘉右卫门到台湾, 谕令台湾“高山国王”纳贡。以家臣而崛起的丰臣秀吉在招降书中自吹是红太阳投胎, 可以使万物生, 也可以使万物死, 你们若不来朝贡, 我就要将你们消灭干净。对这种恐吓讹诈, 台湾土著“高山族”没有理睬。丰臣秀吉见来文的不成, 便决定来武的。1604年 他又派山田长正率兵侵入台湾 在多罗满 今台南县 采掘金矿 还北上攻占鸡窠 今基隆 中国明朝政府得知后 立即增兵澎湖 对山田长正施加军事压力, 山田得不到日本幕府的增援, 害怕挨打, 终于灰溜溜地撤走了。

丰臣秀吉死后, 以大阪之战而傲视群雄的德川家康开启德川幕府时代。在这位以家臣、部将身份而崛起的德川将军统治初期, 曾任长崎代理长官的大海商村山等安忘了丰臣秀吉的前车之鉴, 于1616年向幕府建议出兵侵占台湾。他认为台湾可以作为日本发展南洋贸易的主要根据地, 此人可算是日本最早的“南进论”者。300多年后的1941年,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等沿着他的思路发展了20世纪“新南进论”。

德川幕府根基还不深, 不愿出兵与中国在台湾对垒, 重蹈丰臣秀吉因在朝鲜与中国打仗而加速衰落的覆辙。于是授权村山等安自行组织人员远征台湾 这就是著名的‘村山远征’。

村山等安用13艘舰船组成了“村山舰队”, 公开招募战士3000人, 加以编组训练, 于1616年底高呼“均沾南洋之实”的口号 向台湾发动进攻。不料时运不济 在海面遇到风暴 整个舰队四